

我的老师丁石孙先生

■ 陈维桓

丁石孙先生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最尊敬的一位老师。与他见面时，我们都会称他为“丁先生”，或者亲切地叫他一声“老丁”。

我认识丁先生是在1963年的下半年。当时，丁先生给我们开设“近世代数”课，用的是他和曾肯成等先生正在翻译的、范德瓦尔登著的“代数学”。在1962年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会议之后，学校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恢复了数论、函数论、几何学和代数学等研究方向的人才培养工作，我们重新划分了专业，大家学习热情很高，努力学习新鲜的内容。丁先生的讲课水平很高，工作又极其认真负责，每周除了两次课以外，还到我们宿舍来辅导和答疑。这样，我们就和丁先生建立了亲密的师生关系。“近世代数”课是一年的课程，下学期是聂灵沼先生给我们讲的“域的扩张”和“赋值论”。

再次见到丁先生则是十多年之后的1978年。历经文革的浩劫和磨难，他成为数学系的负责人，而我也要重返北大跟随吴光磊先生

丁石孙与中国数学

继续学习。我到他在蔚秀园的宿舍去看望他，这是与他人合住的一个单元房。

在1977年之后，丁先生作为数学系的一位主要负责人，在恢复教学、科研的正常秩序的过程中起到拨乱反正、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作为在1980年年底留校工作的教师，对于当时系里的状况不可能有清楚的了解，但是从几个侧面已经可以感受到丁先生的工作所产生的一些新气象。那年过年时，恰逢丁先生和聂先生同时搬家到中关村宿舍，他组织几何代数教研室的年轻老师各自准备一个菜，在他家里举办了一次聚会，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地过了一个年，这对于消除教员之间在文革期间产生的隔阂起到十分良好的作用。另外，当时为了加强科研工作成立了北京大学数学研究所，规定了几项至今仍在执行的制度，这里都有丁先生的贡献。比如，学术休假制度和研究所成员的轮换制度。数学系教员在四年教学之后可以享受一年的学术休假，利用这一年可以去国外访问，或到研究所工作。这样既能保障有足够的师资教课，又使教员能够集中精力进修和提高，做科研和必要的学术储备。还有，系里建立了每周的学术报告会的制度，每周在固定时间有一个学术报告，要求教员和研究生参加，进行交流。丁先生还亲力而为。他有一次在报告会上介绍了“公开密钥”问题，这是计算机广泛应用所面对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当时，一院的会议室挤满了来听报告的教员。我关于公开密钥的知识就是从他的报告中获得的。他还提倡跨学科的讨论班。我记得在彭立中主持的一个讨论班上要我介绍微分几何的发展和现状，丁先生也亲自出席。

丁先生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于1983年10月之后获知正在被考虑担任北大校长的职务。12月，他结束在哈佛大学的进修访问，路过加州伯克利回国。海外的朋友们都认为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说明国内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陈省身先生和项武义、伍鸿熙等都对他抱有极大的期望。当时，我也正好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目

睹此场景，并且有幸聆听丁先生在聊天时讲述他在上海念大学时参加学生运动和被捕的情形，还了解到那时丁先生还是一个佛教徒、在解放之后才入党的情况。在大家与丁先生交谈中了解到，鉴于北京大学还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抓好后勤管理工作是当务之急。事实上，在丁先生上任之后，调派了得力干部在学校食堂内部引进竞争机制，很快使北大的食堂成为北京高校的模范，消除了隐藏在学生中的一个严重的不稳定因素。



作者与丁石孙先生在伯克利合影

在80年代初，全国和北大的“左”的思潮还十分严重，改革开放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在体制、职称评定上开始了很多成功的改革尝试。比如，学校把经济系扩充成为经济学院，设立新的经济管理系，成立管理科学中心。为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破格提拔年轻的教员，他自任管理科学中心主任直到90年代北大成立光华经济管理学院为止。回头来看，当时的决策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在人才培养、理论储备方面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而丁先生任中心主任的做法体现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

我的老师丁石孙先生
■ 陈维桓

丁石孙与中国数学

在丁先生担任北大校长的五年多时间里，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生思潮风起云涌的时期，这把丁先生推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上。然而，丁先生始终坚持爱护学生积极性的立场。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之前，丁先生正在美国访问。他在夏威夷发表的讲话肯定了学生运动的初衷，着实使我们大家捏了一把汗。在6月3日，看到丁先生回到北京、亲自主持授予美籍华人数学家樊畿先生北京大学荣誉教授的仪式，我们都稍稍松了一口气。在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的暑假里，教育部批准了丁先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辞呈。1990年暑假，美国数学会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举办以微分几何为主题、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学校，同时要为陈省身先生的80寿辰举行庆典。海外的朋友，包括陈省身先生在内，担心丁先生在国内的处境，希望他能借此机会到美国访问。为此事，我特别去看望了丁先生，他要我转告陈先生，他的处境很安全，出国也没有障碍，但是他认为最近这个时期还是留在国内比较好。所以，他没有出席这次活动。直到1991年，丁先生才接受陈省身先生和Griffiths教授的邀请，分别访问伯克利的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丁先生自担任民盟中央主席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后，政务繁忙，但是一直心系北大和数学学院。比如，为了迎接北大数学系的80年庆，丁先生是撰写北大数学系简史的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最后以他为主，在袁向东和张祖贵协助下完成了《北京大学数学系80年》。在数学系的90年庆和百年庆的活动中，丁先生也贡献了很多力量。

2001年是我的导师吴光磊先生诞辰80周年和去世十周年，我们作为吴先生的学生策划举办纪念吴先生的座谈会和出版纪念文集。我把此事和丁先生一说，他就非常高兴地表示一定要参加这个会。吴先生是民盟盟员，在1958年下放到北京门头沟斋堂时，丁先生是领队，并且和吴先生睡在一个炕上，与吴先生有深厚的友谊。丁先生的热情讲话叙述了吴先生的很多事迹。

2008年是我们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和计算数学专业58级同学入学5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次校友返校活动，大家都希望能请丁先生来参加聚会。我把此事告诉丁先生，他马上答应，并且在聚会上讲了很多鼓励的话，同学们都以亲自听到丁先生的讲话感到荣幸，会后纷纷与他握手问候，一起合影留念。

在丁先生离开北大到民盟任职之后，我们数学系的一些老师经常会在过年过节时去看望他，他也喜欢看到我们。在他家里，经常是无拘无束的聊天，我们谈各自经历的趣事，讲系里的动态，也谈到一些社会现象。他常常静听我们的发言，有时问几句。我们感觉到，此时大概是丁先生精神比较放松、非常愉快的时光。



2010年9月9日，作者夫妇与伍鸿熙（第一排右）夫妇到丁府拜访

丁石孙先生的待人处世是我们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我的老师丁石孙先生
■ 陈维桓